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0年10月,他发起创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坚持战斗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方政治形势日益恶化,李大钊一直受到北洋政府通缉。为了避免遭受敌人迫害,1926年3月底,李大钊带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里,继续领导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按照《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擅自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尤其不能携带枪械进入,这里应该是安全的。

但许多军阀密探和帝国主义间谍千方百计进行侦察。苏联大使馆门口总是停放着几辆洋车,一些密探伪装成车夫工作,大使馆有人出来就被跟踪,直至逮捕。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形势,党组织和战友们都劝他离开,但他认为北京还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坚持留下来继续战斗。后来,李大钊曾对夫人赵纫兰说:“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这样的重要,哪里能离开呢?”奉系军阀在确认李大钊和国共两党领导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后,即派京师警察厅侦缉队严密监视,派暗探化装打入内部,侦察各重要领导人所住房间号码,绘制成图。直到1927年4月初,敌人基本摸清了情况,随时有可能展开大逮捕。在这最后一刻,李大钊还有脱身机会,但他选择了坚守。

选择坚守

1927年4月4日,中共秘密党员杨度从北洋军阀政府官员汪大燮口中得知张作霖已决定包围苏联大使馆兵营,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的消息。当晚,杨度通知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中共秘密党员),要他转告中共组织立即撤离出境。

李大钊得知消息后,也意识到了危险。他设法送走了一大批同志,留下来的都是自愿不走的,还做了焚毁机密文件、练习打枪等一系列的应变准备。据他的长女李星华的回忆:“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他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早晨我们还没醒来他又离开了房间。有时候他也留在家,埋头整理一些书籍和文件。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我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父亲的脸上显得十分严肃。我问父亲:‘爹!为什么把它们烧掉呢?怪可惜的。’父亲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过了一会才说:‘不要它们了,就把它们烧掉。你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他的好友章士钊几十年后回忆:“盖共产党之萃集俄使馆者,约百三十余人,守常闻讯,遣去百许,独二十余人坚守不动。”

他的坚守,正像他倡导的一种精神:“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



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远是成功的代价。”

被捕入狱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与驻华公使团的默许和支持后,派出宪兵、军警等200多人,把东交民巷东、西、北三方围堵起来,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进入大使馆区内,袭击了苏联大使馆西院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对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进行大逮捕。

据李星华的回忆,那天上午母亲赵纫兰带炎华去散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工作,星华坐在外间看报。忽然听到一声枪响,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叫喊声,许多人从矮小的围墙上跳进院子里。李大钊预感到有危险,镇定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手枪,带着星华躲进一间小屋。随着“不要放走一个!”的吼声,全副武装的宪兵、军警、便衣侦探蜂拥而入,用十几支枪口对着李大钊父女俩。一人冲上去夺了李大钊的枪。李大钊被绑带走,星华也被一同带走。

搜捕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逮捕了李大钊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以及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共80余人,同时搜去国共两党的大批文件。

各方营救

李大钊等人被捕后,激起了北京及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北京的广大工人及教育界、新闻界一致奋起营救,坚决要求北洋政府无条件释放李大钊等人。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李大钊

铁肩担道义 信仰铸党魂

革命先驱李大钊就义前后

4月9日,国立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9校校长召开会议,商讨营救办法,公推北京大学校长余文灿、师范大学校长张贻惠为代表,于10日走访张学良,提出5点要求,其中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12日,北京25所大学校长又开会讨论营救办法,决定发表书面声明,要求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杨度利用曾在北洋政府任职的条件,会同梁士诒、罗文干于10日向张作霖提出“请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办理……以彰公允”的建议。章士钊前往张作霖的亲信杨宇霆处商讨营救办法。河北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300多人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先行释放赵纫兰母子。北方铁路工人提出劫狱计划,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得知消息后,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他认为营救计划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不能再要同志们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中共北方组织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忍痛取消了劫狱营救。北方国民军向奉系军阀发出电报,提出警告。北京各报纸都以特字号登载李大钊乃是学者,大学教授,政治犯,不可伤害。苏联政府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召回驻京代表,断绝外交关系。

但是,新旧军阀置强大的社会舆论于不顾,一意孤行,继续实施对李大钊等人蓄谋已久的卑鄙谋杀。

狱中斗争

李大钊被捕后,与奉系军阀展开勇敢机智的斗争,表现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私无畏的英勇气概。在逮捕当天的审讯中,李大钊“态度尚极镇静”。当审问他为什么要居住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时,“李答因与俄人有友谊关系,且喜该处清静云云。”在4月7日的第二次审讯中,他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俨然一共产主义领袖之大概”;“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极不知晓”。在此后多次审讯中,李大钊除对“共产学理及主义,均承认不讳”外,其他一概不知;对所谓种种“罪名”,“则竭力辩白,谓并无此项行动”。他“在狱中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当他在审讯处最后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女儿时,只静静地看着她们,没有对她们说一句话”。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牺牲



李大钊遗体停厝处——浙寺东房